

这里的三封书信、两篇文章,是笔者在翻阅抗战时期《华西日报》时,断断续续发现的。它们均未被《李劫人全集》收录,李眉的《李劫人年谱》,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,亦未提及。但对我们了解李劫人生平,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1939年5月,日军对四川进行大轰炸后,成都的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,大多随各自任职的机构疏散他往。抗战初期一度颇为热闹的成都文坛,一时间陷入了沉寂和停滞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“文协”成都分会决定借《华西日报》副刊版面,创办《文讯》周刊,以加强联系和交流,维系会务正常开展。《文讯》原本决定由赵其文编辑,但赵氏因为事务繁忙,临时改由萧蔓若负责编辑。三封书信,就是最初的决议和最后的实际负责人之变的结果。今天来看,它们完整而真切地勾勒出了李劫人在1940年2月和3月的生活细节,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。

《说昆明》是作者1940年初前往昆明,聘请嘉乐纸厂前工程师梁彬文回川担任厂长的产物。文章分四期,连续刊登在1940年3月24日、3月31日、4月7日、4月14日成都出版的《华西日报》“文讯”副刊上,署名“李劫人”。从文章的副标题“(川滇行之一)”和相关内容来看,作者当时是先到重庆,再经贵阳赴昆明的。在贵阳,曾小有停留,并拟写《说贵阳(川滇行之二)》等。推测起来,可能是因为嘉乐纸厂事忙而打断了写作计划,未能完成。当然,也不排除发表在另外的刊物上而尚未发现的可能。

《乐——为费曼尔女士作》一文,发表在1944年10月8日出版的《华西日报》“每周文艺”副刊上,署名“李劫人”。当时,“文协”成都分会响应总会号召,开展救济贫病作家活动。费曼尔女士为此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,以门票收入捐助“文协”,救济贫病作家。叶圣陶曾在日记中,对这次独奏音乐会的实际情况,作了扼要的叙述:

入夜,与小墨二官三室至署林街礼拜堂听费曼尔女士小提琴独奏。票资悉数捐入文协之援助贫病作家基金。此会由郭子杰夫妇张罗,售票甚多,可得二十万元。大约费女士之提琴亦有名,听者拥挤,可千人,不得票而退出者快快而去。奏琴凡六曲,以不知者听之,似小品反过大品为悦耳。

日记中提到的郭子杰,即郭守有,曾任成都教育厅长,长期担任“文协”成都分会常务理事,对分会的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。

李劫人这篇文章,从“文协”的工作需要出发,带有为费曼尔女士的音乐会“广而告之”的意思。行文中的随意和枝蔓,与此不无关系。尽管带有“任务”性质,文章仍然表达了李劫人对音乐文化独特的理解。关于初到法国时的生活情形的叙述,更是我们了解其生平事迹的重要依据。需要说明的是,《秋江》《乐记》《平沙落雁》《汉书·礼乐志》《儒林外史》等语,原文均无书名号,整理者根据今天的表达习惯作了处理。“霓裳羽衣”等,因在可加可不加之间,故仍按原文抄录。

原文中难以辨识的字,用“□”代替。原文所无,但根据上下文推断应有的字,则放在方括号“[]”内,以示系整理者所加。不规范的标点符号,和极个别一望而知的手民之误,在最大限度尊重原文和不影响意思表达的前提下,则据当前规范作了调整。

1940年3月6日 致赵其文

其文先生:

原以为《文讯》写一二短篇文字,不料二月十九日由昆明重庆跑了一遭归来,去年所患之湿气病,便又发生。这还罢了,兼以右边大牙,动摇作痛,历经月余,忍无可忍,冒险就牙“匠”拔去。据说,拔牙之后,必须休息,忽然为嘉乐纸厂[董]事会人说话,东奔西驰,未得一刻宁静。果不其然,数日之后,乃大疲倦,只好回菱窠蜷伏。不料精神尚未回复,而儿子患鼻疾,经名医诊治,说其中有白喉菌。儿子稍好,女子果患急性白喉,迄今一周,又幸经名医治愈。如此不得闲,稍有空暇,又苦于奇痒爬搔。生来本只两只手,以右手最得用,而右手最忙,以故,所谓短篇文字,姑暂请假。

李劫人拜启(三月六日)

1940年3月8日 致赵其文

其文先生:

承询近日生活情况,大略已见昨日短函。今再奉告一事,便是自去年入秋以来,连月好着走路的甚为高兴,只是苦了农家。菱窠在东门外沙河堡篆角堰边,堰大三十余亩,往年自秋租夏,盈盈盈盈。从筑菱窠,水干见底,买一小羊放牧其间,今已肥硕可卖十七八元。大家没水吃没水用,遂存心打一水井。然而买溢砖破石,每万斤要六十五元,雇泥工掘井,估计需百余工。每工自六角二分上涨至一元四角,然而情势所迫,不能不打,今已打至三丈,仍在挖石取土,还须打若干丈,方能及泉,不可知也。古人谓钱为泉,诚然诚然,又无钱即无泉。一回菱窠,便伏土洞边,闻丁丁下锄,又恍惚雷索伯之开苏彝士。

李劫人拜启(三月八日)

1940年3月16日 致萧蔓若

蔓若先生大鉴:

十五日函,十六日下午一点许递到,十里邮程,亦可谓快矣。拙稿事凭,尊意处理之可也。本来应命行笔,迹近塞责。三月二十六日又将起身赴嘉定,四月上旬可归,俟有余日,再写《说贵阳》。贱恙不能说好,连日以疏肝溶水痛洗,奇痒稍止,手指间流黄水,结血疮如故。菱窠掘井,十四日及泉,泉水涌出,历半日即深六尺许;方正在欣喜,而十五日一雨,井周黄土全坍,工友以术堵之,术不验,不顾而去,诿谓运气不好。并深四丈,黄土占多半,红砂石占多半,费工一百〇五个,大约六十多工,穷诸虚耗矣。雨我公田诚可喜,而瞻顾断井,则又怅怅。专复并颂无恙!

李劫人再拜(三月十六日夜)

说昆明(川滇行之一)

一

昆明是好地方。第一天气好,第二湖山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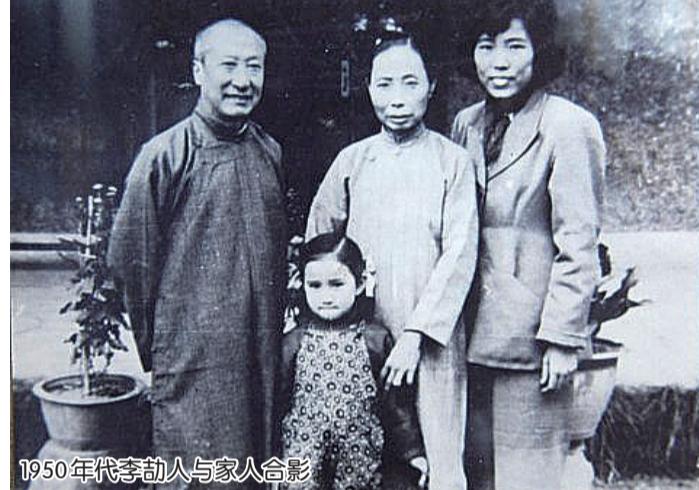
# 《文讯》副刊与李劫人佚文五篇

□段从学



1935年与家人合影

为三合土之不妙,口头也说过,报纸上间或也说过,主张在灌县选取坚石打成大砖式样数年一翻,可以四翻。四翻之后,尚可修断,即有破溢,取换亦便;自然,木砖街面如上海之南京路,诚然太好,次之如柏油路面,亦何不豪华?二者不可得,则无宁效法昆明。到底人微言轻,说了还是说了,至今成都街面,其为酥锅魁之皮也如故,安望其不费钱费力,随时修随时溢,而天晴之后,全市



1950年代李劫人与家人合影

有如灰城!

不过昆明街面,究竟人工还不够,旧的街道被鞋底车辆磨研久了,倒极光滑,而新的则尚待鞋底车轮慢慢的去磨研,这笔费用,未免太大。

中国各处的城垣,无论从哪方面说,(除风水之说外)实在无保留之必要。而城垣拆除,单独将城洞及城楼留下,加以装饰,使其变为好好一座美观的台阁,其下辟为圆场,绕以铁组,取法北平之正阳门,倒是点石成金的作法。昆明之近日楼,本为大南门城楼,便是这样办的。看起来,实在比较成都城门之化为六个大缺口,高明得多。

昆明除了一般旧式房屋建筑以及街上风沙之大,绝似北平外,余如金马碧鸡两道彩坊,也太像北平,只嫌近三四十年的新建筑,大抵多趋码头格调的“洋”式。其不美观调和,有如在美人素面上印上一块图案画。

四

圆通寺靠近城的东北,是昆明城内一个很好的游览处。然而据我看,唐继尧的陵园,或有过之。唐陵也正在圆通寺之侧的一个山头上。

关于唐氏,除大观楼的铜像外,据我们所知,在昆明城内还有两个地方。其一,是现今的云南大学,以前为唐氏手创的东陆大学,校址在青云街,巍峙于翠湖之北。所据山头,虽不如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之高,毕竟雄伟可观。

大学故址原为试院,一如四川大学文法学院之为旧贡院也。幅员知不及旧贡院之大,而改为大学后的建筑,却远优四川大学。尤其唐氏所建造的那所大楼,其堂皇过于旧贡院内现存的明远楼和至公堂。

其二,即前言之陵园。唐氏埋骨之处,正当一个山头。当面全为云南所产的大理石修砌,气象极佳。园内一部分房屋现租与美国领事作领事馆,别有唐氏藏书之屋一所,书不见多,仅二十余橱。据守者云,尚有一部分藏在别处。唐氏能诗能文,生平颇有抱负。其他不论,单看遗书二十余橱,以及东陆大学之大殿,足以见其胸襟。

五

初到昆明,见牛车满路,因而发生两种想头:以牛车本身言,是南国风光;而就车制言,实足见大略遗规,如此拙陋之作,何竟保存至于三四千年,而不变?

牛车之外,复多小马,所驼物皆分载背之两旁。

畜运甚多,人运则少,偶见一二,多口口可笑,如运木条,有长至丈外者,亦以一担担之。我想,这大抵由于畜运方便,故人运乃不技巧。四川省内人运之比较技巧,实缘畜运之不发达。这种相对的道理,从四川官道之进退上,大可见之。

城内五华山下的翠湖,也是这毛病。朋友胡君前过昆明,曾寄一信,论及翠湖,诋为臭水一塘。据我看,所论稍为过甚一点,要是好生布置一下,再多多种些树,将朽败的木桥,更为石梁,再将水面加以清洁,沿湖以外的建筑,稍稍与以归划,虽然不及法国里昂的金头公园,然在中国西南各处的公园中,终可以首屈一指。

中国人对于公共园林的布置,精神都有点不足,这诚然不大妙,但我希望在将来建国大业少完成之时,精神生活的范围从而扩大。首先是一般能够造就风气的人物,豁然明畅,既不专迷惘于最摩登的形式,复不要庭草不除,居室不治,块然独坐,大讲其正心诚意的内学,庶几中国园林,至少可以复到平山横塘之盛。

六

昆明的生活程度,并不比内地一般高。以清洁整齐而言,似乎比之重庆还有不如之处。而生活的费用,恐怕连今日的香港,也难比其高昂。前面曾略及人力车之贵,这里再稍稍报道点粮食的价值。据我所知,米每担重市称一百二十斤,在二月六日以前,一月底以后,涨至七八十元,并非好米。青菜(昆明人呼之为苦菜,因此有谚曰:云南

这两种疑惑,可以说,直至民国八年,到法国去后,慰目所接,才给我从根拔出,而发生了两个“恍然”。

第一个“恍然”,在实际上是第二个,关于“目”的,这话说来过长,对于本篇,不免有“喧宾”之势,姑且从略。

且说第二个“恍然”,关于“耳”的。那是初到法国,住在蒙达尔日几个月内的事。

蒙达尔日这小城市,距巴黎只三小时多的火车程,上月报纸上报道美军杀奔巴黎时,曾提过它的名字,因为是个小地方,称之为蒙达尔日驿,读者自不在意。不过这小地方给我的印象太深,于今二十五年矣,偶一出口,恍惚在夕阳西下,散步整洁清静的林荫道上,各家窗户微启,不是这家钢琴,便是那家提琴,幽扬婉转,沁人心脾。说实话,我的耳朵也和最大多数的耳朵一样,自幼一直到十八岁,所受的音乐训练,上面已经说过,不过是那些,加之以前的教师教训,谓玩音乐唱曲子的都不是佳子弟,不屑接近,说是恐怕花了心不能专心读书,诚知也有真正弹七弦琴,弹琵琶,弹三弦,弹胡琴,以及吹笛子,吹洞箫,拉胡琴的好手们,但是无缘接近,实在那时也不大通行,所以追与西洋音乐接触起来,倒是提琴较能领受,钢琴哩,则是经过了相当时间,才探到了它的韵味。

其后到了巴黎,接近音乐的机会更多了。最普通的在夏日下午,各公园各园林中的乐队,冬日黄昏,各音乐咖啡店里的乐队,名贵的如在下午四点至六点峨北纳的法国音乐院的独奏与合奏,以及各职业的非职业的音乐会等。有一些用不着花钱,有一些花钱也不多。(所谓生活程度高者,谓其享受之程度高,而花费并不一定大,例如在当时之巴黎,听峨北纳之名贵音乐,不过纳门票三佛郎,而咖啡店之音乐并不算坏,所费不过七十五生丁之咖啡一杯,或啤酒一杯而已。又例如民国二十八年时,在北平,包汽车一天,不论远近,连人带油,不过大洋八元,较任何交通工具价廉而迅速安适。苟其所费绝大,而享受毫无,例如今日由内江变黄鱼乘车来成都之学生,有花上万元之多,曾挤立卡车之上,如束薪,日晒则温度高达一百二十度以上,雨淋则裤带亦为之湿,不幸仍须走三天,时时推车,更不幸到龙泉山顶,必被抛下,以避检查,仍令其背包挟伞,黄昏摸索,步行七十余华里而到牛市口,此只能说是生活费用太高,或生活经济太高,而程度则太低,以其低在坐滑竿下也。)

于是久而久之乃更“恍然”,《乐记》中所论种种,实有至理。而同学王光祈先生之舍政经本行不学,而另起炉灶,以究西洋乐理,遂亦力赞之。于是亦慨乎中国音乐之衰朽,其末流至采用日本化的东西。其悲观,在百年中实较鸦片烟之役为大。

更甚于是从而知夫中国之复兴,要在民族之能否恢复音乐之感受!一个民族而失去音乐感受性,可说这民族的其他一切,都将成为问题。因此,前若干年曾发过一个议论,说苗民是将来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,因为他们还有芦笙,还有跳月之舞。也因此,听见《毛毛雨》《太阳照金姐》等新曲,而大感到中国前途之无望!

可是好事,近十年,我们音乐却大大的推了一步了!这是我国民族的一个转机,不过我想说,我们先不必想恢复我们的古乐,不管琴也好,瑟也好,如其弦子弹起来仍旧只闻绳子邦邦响,玩起来,只闻竹片刷刷响,我们还是姑且全部采用西洋乐器的为是。本来我国乐器自朝鲜的箜篌起,几何不是外国传来的?今日我们吹箫,名叫尺八,绝非秦国齐王吹的箫,秦国的箫像笙,所以箫笙合奏,箫笙同类都叫参考,都有点像一公鸡尾巴,故说能够引凤。(读者注意,我上面几句,只是偶尔想起,随便写写,或许有错,绝非有意自吹为什么科学的文艺批评,以及为什么考古的国乐器乐,你们掘起我的祖国,我也不敢无聊聊到妄测什么鸟专家,或是什么鸟大家。我不敢那样无耻!)

我想在音乐空气还没有达到十分时,尚不忙自己制谱,首先我们从空气中去培育音乐天才,要从空气中去给天才以发育的资料。这种培养空气的工夫,不是短时间的事。然而,我从杨云慧女士口中,听说及费曼尔女士的一生,我又最来了个“恍然”,知道使音乐空气浓厚,也不一定要多少时间,而且中国音乐只管丧失有年,而种子终于存在,只要环境适宜,依然可以勃勃蓬蓬勃发生出来的。不信吗?我再举二证。

其一,自明初以举国以八股取士。于是凡读书人自五经而外,只读八股,只做八股,大流所及,如徐灵胎道情所咏,如吴木山《儒林外史》所描写,其时之诗词歌赋,举凡关乎性情之作,几目为杂学,真正读书人,是不准治杂学的。然而,我们翻开文学史看,明清五百年中,诗人文客,岂少也哉。甚至举世不屑的白话小说,也大部大部的产生出来,可见人到底不是泥因,反性情的训学不惟无益,其结果往往还变成了鲧的治水方法。所以,我甚欲劝劝掌教育的先生们,少干点蠢事,还是学学禹的治水方法罢。

其二,记得某年,曾看见一本什么杂志,载了一段奇谈,据说,在埃及(或是巴比伦)古坟中,掘出一个瓦瓶,盛有麦粒少许。考其时,已在三千年以上。试将麦粒种下,居然发芽。一粒埋藏三千余年之生机,尚且可以再生,这希望真给了我们不小啊。

不过,费曼尔女士,已不是我国的音乐种子,而是一茎挺壮的苗了,这苗,还正在向开花结实的前途迈进。我因为不认识她,而且也是一个未曾受过训练的耳朵之一,已如上述,故不懂怎样评论她,以及她的本领。好在,快了,十月九日,她有一次演奏会,纪念她那英勇殉国的丈夫,并且将其同情,及于一般贫病作家,会前会后,自然有很多的专业内行去发表专谈,我不过站在旁边,很高兴地说这一篇不落边沿的闲话,以为“楔子”而已。